

在中华文化日益走向复兴,中华民族日益以高昂的姿态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时候,树立文化自信心,培养文化自信力,这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必然,也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核心内涵。文化自信是全球化时代面对其他文化尤其是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之下,对自己民族文化尤其是其文化核心价值观,在世界民族文化格局中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充分认同和肯定。因此,这里的文化自信是一种文化价值比较的结果,而不纯粹是一种自我陶醉或者盲目自大,抑或不是敝帚自珍式的自我封闭,它既来自于对自我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充分认识,更是来自于对民族文化中世界性、普遍性价值的深入理解。

在西方殖民主义时期,以“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视角来看,中华文化作为东方文化,它是作为非西方的“他者”而存在的,而且这个“他者”是一种与西方文明不可同日而语的愚昧落后的文化“景观”。殖民主义理论很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因为正是这种特殊性构成了他们关于东方文化形象的想象性建构。这种文化景观的存在只是满足西方人的猎奇与高人一等的自我优越感,映衬着西方文明的高度繁荣和普遍有效。东方文化所呈现的只是属于特定区域内落后民族的世界,不具有任何的普遍价值,也无任何与其相互交流的必要。这种西方殖民主义视角始终强调东方文化的特殊性,但是,它既看不到东方文化所具有的普世价值,更不认为其特殊性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具有独特的不可或缺的贡献,东方文化的特殊性成了一种无价值的奇异性,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是需要以西方文化来改造的东西。

随着后殖民主义的到来,殖民主义时期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念受到挑战与颠覆。现在是文化多元主义盛行,不再认为东方文化是一种没有存在合法性的文化,而是认为人类文化是平等的,各种文化都有存在的权利与必要,各种文化的特殊性应该受到尊重乃至保护、弘扬,并且格外加以强调那些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表面上看起来,这种文化观为各种非西方文化寻找到了存在的理由与生存空间,各种非西方文化也因此都在努力地挖掘本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奇异性,让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得以充分展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乃至认同感都在这种文化独特魅力中得到充分张扬。这些年国民俗文化的异常火爆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是合拍的。但是,这里所谓的文化特殊性隐含的意思不外乎是此种文化

文化自信与民族文化价值

□金永兵

局限于特定时空的有限性,是“地方知识”、“地方文化”,这些特殊性并不是构成人类文化核心层面的普遍有效的成分,那些普遍性的东西仍然只能从西方文化中去找。我们很难见到西方学术界声称或者寻找西方文化的特殊性,总是见到他们慷慨地表达对非西方文化特殊习俗的高度尊重,正如一个高贵者俯身来和贫贱者交谈一样。一个很明显的根据是,西方学界可以很尊重乃至很羡慕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甚至是越特殊、越少见、越奇异,就越好。但是,他们眼中看到的只是这些特殊的文化,却从不会认同生存于这些特殊文化之中的人们的活生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式,不会因为尊重这些文化的特殊性而尊重世界各民族人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一面是高调宣称尊重文化差异,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一面是特别强调自由、民主的西方意识形态和西方的政治文明、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从这种态度分裂的症候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们对“他者”特殊性的尊重本质上并没有远离“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

因此,文化自信一定要建立在对本民族文化价值尤其是核心价值内容的深刻理性认识基础之上,而不是仅凭一腔热情和自以为是的民族主义情绪。我想这里需要从两个方面弄清楚本民族文化的价值:其一是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问题。受历史传统、现实政治经济制度、地理气候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合力影响和塑造,每个民族都必然有自己文化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既是一种局部的局限性,但同时也由于它的独一无二性、不可复制性,从而具有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成为对人类文化的独特的不可替代甚至不可或缺的贡献。并且,需要把这种独特性的贡献及其对于其他文化的那种互补性价值充分张扬出来,这才是文化特殊性的意义所在,是文化自信的根据所在,而不能只是沾沾自喜于某种纯粹的特殊性,甚

至是只为了与众不同而追求、发展一些与人类普遍价值相违背的怪异的东西。这正如一个人的个性是其特殊性所致,但是决不可将一些特殊的怪癖当作性格魅力来张扬,不可形成“恶劣的个性”。正如鲁迅当年所批判的,不能把裹小脚、打麻将等当做是我们真正的国粹。

其二是大力弘扬和倡导本民族文化中具有普遍性价值的成分。任何民族文化都拥有不同程度的普遍性。中华文化经历五千年风雨而依然强盛,其中必然有最适合人类发展的文明要素。社会主义作为人类最先进的制度在中国虽遇曲折,但是却能不断发展并生机勃勃,其中自然拥有极为丰富的人类现代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普遍性因素。这些核心要素是什么,需要我们认真地去挖掘去弘扬。这里的文化价值的普遍性不是建立在以西方价值观念为准绳的基础之上,不能是所谓与西方一致的即为普世的,与西方不同的即为特殊的。我们常常可以见到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西方文化谈人道主义,于是我国古代的人本理论便有了普遍性。这里的逻辑是很有大问题的,强调人、强调民众的重要性恰恰是各民族文化中最初的民主主义的成分,不是因为某种西方文化强调了这一方面,这一方面便拥有普遍性价值,而是说西方文化也强调这一点,所以它也有普遍性价值。认识了这个逻辑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努力寻找、建构人类文明所需要的普遍性价值,而不是在西方的标准答案的参照下做选择。同时,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看到,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其他文化之间的巨大不同和相互补充的可能,既不是以中华文化去替代西方文化以及其他文化,也不是以西方文化以及其他文化为主体用中华文化去补充它们,它们是各种不同的文化系统,都有普遍性价值,也都有不可或缺的独特贡献,同时也都存在随着历史发展日益丧失存在合理性的糟粕的东西。只有建立民族主体性,才能在复杂的文化交往与斗争中不丧失

自我,才有建立文化自信的可能。清理、研究中华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将会为我们民族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自信力建设打下最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是一个艰巨而重要的时代命题。

我们总是批判西方文化所谓的普世价值的虚伪性,搞得人家以为我们的社会文化中根本就没有普遍性价值。其实,我们在批判的同时,也要理直气壮地把我们的好东西拿出来,更多地弘扬我们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普遍性的东西。低声嗫嚅,害羞不语,像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姑娘,怎么可能建立起文化的自信心、自信力?只“破”不“立”是没有力量的。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里的“中国特色”的内涵是明确的,不是纯粹的特殊性的东西,而是包含了极为丰富的普遍性的价值,只看到“中国特色”概念的特殊性,而忽视其中普遍性内涵,是非常片面的。当前理论界存在大量的滥用“中国特色”概念的现象,只要是说中国的事情,就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变成了中国特殊性的同义语,这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关于这一概念的特殊性层面的误解。其实,我们当代的文化谱系中具有普遍性价值的东西很多,概括地说,政治上基础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经济上的共同富裕理想、文化上的和谐共生的传统,等等。有人可能会说你说的都没有真正实现啊。这自然是事实,但是所有能被称作普遍性的东西都是被集中化、概括化的东西,都是一种“理想型”,无论这种普遍性来自于西方的文化生活还是来自于东方的文化生活。普遍性文化并不是远离我们日常生活的具体性、特殊性,而是存在于其中,这里我们要考察的是某种普遍性价值在那种文化生活中有更多的成分、有实现的更大的可能,割裂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看问题,人类将永远没有普遍性的东西可言。并且,正是因为这种普遍性价值还没有被我们的日常实践充分展现出来,我们更要大力挖掘、深入思考、积极弘扬,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人们的个体理想和社会的发展蓝图从形而上的意义上说都是需要以这种普遍性价值来参照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人类发展的目标。

文化自信与文艺创作(21)

文学期刊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互动

□庄丹华

文学期刊作为新时期发表文学创作的重要平台,固然与文学的繁盛息息相关,文学期刊通过登载作品、发表评论,及其作为媒体的作用影响整个文学生态系统,但与此同时,期刊的编辑思想及其指导下的期刊行为,也与所在时段的社会意识、文化思潮、审美理想及文学观念密不可分,也就是说,文学期刊所采取的行为与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关系非常密切,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两者互相影响和推进,共同带动文学创作的发展与兴盛。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个新时期文学的发轫期,刚经历过十年浩劫的知识分子高度重视人的解放,以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为己任,以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与文化为使命,他们具有强烈的启蒙情结、精英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在大众的追捧和热议中,精英知识分子迅速建立起自己的话语霸权。改革开放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对大众意识和文学创作影响深刻,到80年代中期,新时期文学加速发展与革新。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等,在文学精英、文学期刊和受众的共同推动下,80年代文坛一片欣欣向荣,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和精英文学地位崇高,文学期刊适逢其会。文化思潮、社会意识因时代而促成,又直接作用于文学刊物,影响其编辑思想和行为,并带来文学刊物自身的发展。

但没过多久,随着社会转型加剧,精英知识分子的地位从中心向边缘滑落。20世纪90年代,文化界面临的是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社会价值观念和大众审美需求趋向多元。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面对90年代的文化市场和新传播媒介,受到极大的冲击,出版社、文学刊物和文学机构对受众需求的重视程度发生了巨大转变。市场经济价值观念直接影响文学和文化市场,文学界发生裂变,大众通俗文学

和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精英文学并驾齐驱,传统文学刊物被迫作出调整。在过去,读者相信作家所描绘的生活的真实性,但随着现代传媒对个人生活的覆盖,公众在不自觉中开始接受传媒的引导,个人选择和判断的空间加大,人们对作家指认的事物开始提出质疑,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作家的写作信心从外部世界日益退回到个体的内部世界。与此相对应,在各类文学期刊中,我们看到了更多对人类精神的反省和认识。

面对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文学期刊既希望自己能大步走入市场,又希望能保持精英知识分子的风骨。但是,文学市场和文化生产领域已呈现出去精英化的趋势。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网络作为最自由的媒介,直接降低了作家的准入门槛,大量网络文学和网络写手出现,文学神圣光环消失。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直接冲击着文学刊物,乃至威胁到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已被推入市场的文学期刊的生死存亡,也“逼迫”刊物作出自己的应对和变革,从文学刊物编辑思想和期刊行为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个动向。如浙江的文学期刊《江南》,在2005年正视传统文学刊物被边缘化的现状,放下身段探寻市场动向,加强与读者的互动,调整栏目设置,在地域文化资源的挖掘上大做文章,以散文随笔类栏目将浙江的地域人文做足做好。在保留原有版块的基础上,《江南》推出了“江南诗歌大展·浙江卷”,编选之际也得到热烈响应。但是,《江南》的发行量仍旧下滑,最低谷时只有2000册,刊物成了文人的自娱自乐,其中既有精英文学被市场消解的无奈,也反映出文学刊物和文化市场,时代精神的疏离。

要使文学刊物在新的文化环境中获得生机,必须走出象牙塔深入了解这个市场,需要发掘既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又有老到的市场运作能力的人



略说作序

□蔡润田

日前,翻阅旧雨新知、文朋书友的赠书,见到林建法1991年秋惠赠的《寻找精灵》(副题为“文学情感及其他”)一书。真是百感交集。

我与建法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他还在《福建文学》做编辑,我与《山西文学》的另外两位编辑前往造访取经,是他热情接待了我们,及至后来,他调到辽宁《当代作家评论》编辑部,我去沈阳,他还与妻子在家款待我。但后来,由于我的疏忽、慵懒,没能再多与他联系,竟嫌生分了。如今,当看到此书《后记》中的一段话时,不禁感慨系之。在这篇《后记》中,他说:在发表《艺术的本质是情感》之后,“‘成功’鼓舞了我,陆续写了一组‘审美情感论’的文章。《批评家》杂志副主编蔡润田先生读了后来的几篇手稿,接连写了几封长信,热情鼓励我稍加整理分寄几家刊物。《论情感体验》等好几篇文章就是经蔡先生编发的。因此,这次结集出版,我曾请蔡先生写序,他谢绝了。他希望我能找个名家来写。我这才将我的朋友刁斗写过我的一篇印象记作为代序。”

建法无意责难我,我却觉得心里好像打翻了五味坛子,内疚、懊悔、愧怍,说不清是何滋味。其实,“谢绝”并非我的本意,说“谢绝”似嫌言重了。推辞婉拒,可为而不为庶几可称“谢绝”。我则不然,虽说对建法所论列的问题并不生疏,且颇欣赏,却并无研究,是很难说个子丑寅卯来的。而就知人论世来说,也不及刁斗作为同事过从密切。以我枯涩的笔头是写不来刁斗那样入人至深且活泼、谐谑的文字来的。所以,我之未敢作序,非为也,实不能为。

我想,但凡为人作序,应对相关课题有较全面、熟谙的了解,能较精准的把握著作的要义。对作者的心性、阅历也须有较深入的把握、体认。除此之外,为郑重计,请有关方面的专家操觚是相宜的。我不乏自知之明,不敢率尔为序,倒不完全因为人微言轻,多半还是知之不多。这是我对我建法兄既感歉疚又觉惭怍的原因所在。

刘勰有云:“序以建言,首引情本”(《文心雕龙·诠赋》)。就是说,序言不仅要说明作者写作的缘起,还应阐发著述的情事根据与全书的主旨。这方面,止于泛泛的了解,序是难以写好的。现在,常常看到一些人为他人作序,或胸无丘壑,敷衍了事。或言不及义,搔不到痒处。或顾左右而言他,与原著多无瓜葛。原因即在于作序的人对所要言说的对象、论题一知半解或完全外行。勉强“为文造情”,自然难免牛头不对马

嘴。明代顾炎武就对此颇有微词,他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序”(《日知录》卷十九《书不当两序》)。可惜,我们许多人还不以为“患”,而好之、为之。

其实,序言的写作是需要一定的相关知识或研究为支撑的。有了这个功夫,对这些了然于心,写起来才能得心应手,驱遣自如,甚或会心淋漓,不能自己。王夫之为张载《西铭》写的序(或曰“题解”)达千余字,超出《西铭》5倍之多。胡适为《水浒传》《红楼梦》写得考证传序或引论都长达数万言。其中《水浒传》的序有4.5万多字,“算起来比萧伯纳为他所写的剧本所加写的导言平均长度还要长一些”(《胡适口述自传》)。更有甚者,有的惟其长,还不得不独立成书。

本意是为他人著述作序或导论,不期然竟写成一部自成体系的大书,以至序“与原书埒”。于是乎,以序当书,还得请对方或他人为自己的书作序。梁启超、唐德刚就都曾结撰了这样的鸿篇巨制,堪为学界美谈。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中说:“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而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他不无感慨地说“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于是,“脱稿后,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

蒋方震,字百里,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时与蔡锷齐名,后来他留学德国,回国后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及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最重要的军事论著集《国防论》(1937年初版)中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1921年,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为之作序。梁启超认为清代的学术思想在许多地方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似,序写大加发挥,广泛评述,下笔不能自休,竟写了5万多字,跟原书的字数都差不多了,梁氏只好另作短序。后来梁将这篇长序改写、充实,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作序。可算民国学术界一大佳话。

《欧洲文艺复兴史》自1921年问世后,大受欢迎,14个月内就连续再版了三次。而因序成书的《清代学术概论》之精炼、概括,线索明晰,也向为学界称道。书中有清一代的学术主潮与基本特征了。同时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颇有创新。是以现代文化为指导研究传统学术史的佳作。此后的学者,大体都是循着此书的框架和思路展开研究的。可谓清学史研究领域内的一本必读书。

无独有偶,唐德刚为其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序写也是长序成书。唐说:“在动手翻译这本小书之前,我曾遵刘绍唐先生之嘱,先写一篇《导言》或《序文》,谁知一写就阴差阳错,糊里糊涂地写了十余万言;结果,自成一部小书,取名《胡适杂忆》,反要请周策纵、夏志清两先生来为我作序了。”(《胡适口述自传》)。这由序而书,绝非繁冗、平庸,而是意涵丰赡,别具一格的佳构力作。夏志清序中说:“《胡适杂忆》不只是篇回忆录,它畅谈历史、政治、哲学、文学、文字学,以及其他一切胡适生前关注的学问,比起《李宗仁回忆录》来,更令人见到德刚才气纵横、博学多智的一面。”

《胡适口述自传》出版后,我想他应公认为是当代中国独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倒没有走胡适的老路,写一清如水的纯白话。德刚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诙谐,写起文章来,口无遮拦,气势极盛,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周策纵在序中说:“大凡文字写得最美最生动的,最难同时得事理的平实,因为作者不能不有艺术的夸张。这在王充的《论衡》里便叫作‘艺增’。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他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我们最好在读他所说某一点时,再看看他在另一个所在说了些什么,要看他如何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尽情极致、穷态极妍地描绘和辩论,如此,你才能更好地把握到他的真意。唐德刚的‘艺增’运用在不同的角度,这是他最好的绝招和自解。”把原本为序的文章写得如此之长,如此之美,足见作者的功力了。

综上所述,写序言、绪论、题解、导论之类,看似无一定之规,人皆可为。但写得是否切当、充实则大可轩轾,从中也最能见出作者的识见、心性来。正因为如此,我想,所知不多,无话可说,则不必虚应故事,敷衍塞责。更不能强不知为知,妄加评骘,以至郢书燕说。当然,如若腹笥充盈,自也不妨乘兴挥洒,即令序“与原书埒”,或许还可“艺增”为一部“美言”大书亦未可知。

广告

中篇小说 刘万福案件···邵丽
一家之主···王棵
快餐刷···王秀梅
活色···姬中宪
挂在墙上的自行车···映川
边塞纪事···董夏青青
金石···黄咏梅
Q老爷不在的日子···刘丽朵
温州小店生意经···王手
波澜壮阔的人生···程树椿
素书楼与语堂故居···王炳根
在繁体字的迷宫中···蒋蓝
倒影···格致
刺猬悲歌···拾柴
粉旗袍···郑豫皖
马赛克拼图···陆健
短章···刘向东
唐果等
信息 2011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揭晓
2011年总目录
邮发代号:2-4。月刊,每月3日出版。定价:10.00元。邮购部地址:100125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联系电话:010-65030264。

2011年12月9日 星期五

2011年12月9日 星期五